

● 德国史

相对稳定时期的魏玛共和国民主政治

陈 从 阳

(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陈从阳(1965-),男,湖北汉川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咸宁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20世纪世界史和德国近现代史研究。

[摘要] 相对稳定时期(1924-1929),魏玛共和国议会民主制得以维持和发展,亲共和国的政党仍占重要地位,反共和国的政治势力处于低潮,普鲁士作为“民主的堡垒”日益凸现,在巴伐利亚、国防军中也发生了某些积极变化。与此同时,亲共和国的政党也表现出力量发展不平衡与影响下降的趋势,政党政治碎片化的加速、反共和国政治势力重新聚集力量并开展反共和国的联合行动、民主政治不断右转、政党与议会制度危机重重,显示了魏玛共和国政治稳定的相对性。这一情况的发生是与共和国强大旧势力的存在与保守反动思想的影响、劳资力量对比的变化、社会民主党采取的策略路线、中间等级的恐慌、民族主义和民族情绪的影响分不开的。

[关键词] 魏玛共和国;民主政治;相对稳定

[中图分类号] K516.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4)03-0303-07

相对稳定时期魏玛共和国在政治方面取得了哪些积极进展,潜伏着哪些危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目前国内史学界鲜有人对此进行探讨,笔者愿就此问题作一初步分析。

—

魏玛共和国政治上的相对稳定首先表现在:共和国结束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连绵不断的针对共和国的左翼的革命、暴动和右翼的动乱和叛乱,出现了政治上相对安宁的局面。自1918年11月到1922年底止,德国至少发生了376起政治谋杀事件。许多著名人物如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和瓦尔特·拉特瑙等等都倒在了血泊之中^[1](第102页)。相对稳定时期,政治恐怖和暴力事件得到了有效控制,数量大为减少。

在“金色的20年代”,若包括施特雷泽曼建立的2届内阁,共和国共组织了9届内阁,共和国政府的平均生存期有所延长。从1928年6月28日到1930年3月30日,共和国一直处在社会民主党米勒政府领导下,成为共和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政府。从第一届马克思内阁到米勒社民党内阁,7届政府的平均生存期达到295天^[2](第32-33页)。据统计,从1923年8月到1930年3月,共和国政府基本上掌握在大约50名政党和无党派政治要人手中。中央党、人民党等参加了所有的几届政府,保证了共和国政策一定程度上的连续性,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对外政策方面:从1923到1929年,施特雷泽曼一直担任外长,他推行了建立在与西方国家合作基础上的、带有温和色彩的修约政策,赢得了议会内政党多数派的支持。

与此同时,拥护共和国的左翼政党、中间政党等势力总体保持稳定。相对稳定时期共举行了3次国会

选举,社民党、民主党、中央党、人民党在国会选举中的得票上下波动,甚至有所下降。但从全局来看,上述4个政党在共和国政治中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在1928年5月的国会选举中,社民党、民主党、中央党、人民党仍然获得了45.5%的选票和285个议席^[3](第762-763页)。作为共和国民主政治的重要支柱,社民党在相对稳定时期的历届国会选举中始终保持着国会第一大党的地位。截至1928年,社民党组织包括1000多个地方支部,90多万党员以及与它关系密切的近500万名自由工会会员^[4](第177页)。

以施特雷泽曼为代表的德国人民党对共和国态度的转变是共和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事件。一战前和战中,施特雷泽曼以其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君主主义和外交上的扩张主义著称。民族自由党分裂后,施特雷泽曼1919年建立人民党。人民党起先对共和国态度冷淡,施特雷泽曼在卡普政变中的暧昧表现被称为他政治生涯中“最难以令人相信的插曲之一”^[5](P.66)。“卡普政变”的失败以及埃茨贝格和拉特瑙的被暗杀、共和国深重的危机使施特雷泽曼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他逐步实现了向“理性的共和主义者”的转变,成为共和国少数几个伟大政治家之一。与拥护共和国的政党形成鲜明对比,相对稳定时期,反共和国的极左和极右势力遭到挫败。这一时期共产党内政治斗争不断,由于采取了从工会中抽身的政策等原因,1923—1924年处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工会力量遭到很大削弱^[6](P.119—121)。1928年5月,共产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的总选票比1924年5月少了428500张。啤酒馆政变后,希特勒入狱,民社党组织一度遭解散。1925年前后,民社党内部离心倾向增强,南北组织对峙。纳粹党势力一路走低,在1924到1928年三次国会选举中,纳粹党共损失了110多万张选票,丢掉了20个国会议席。

面对共和国的相对稳定,德国保守政党——民族人民党开始改变策略。1925年1月,4名民族人民党人参加了政府。民族人民党这一举措虽然更多受到分享权利的驱使和建立资产阶级政党联合统治的策略考虑^[7](P.90-91)。但是,民族人民党的入阁毕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1927年2月,民族人民党再度入阁。在民族人民党的合作下,第四届马克思内阁取得了广泛的立法成就,制定了包括失业保险法案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法律^[8](P.232-233)。

相对稳定时期普鲁士作为共和国“民主的堡垒”的作用更加凸现。在社民党政治家布劳恩的领导下,在普鲁士由社民党、民主党、中央党组成的“魏玛联盟”得到巩固。在共和国存在的14年中,普鲁士只进行了6次选举,组织了7届内阁,从1920年3月到1932年6月(除1921、1925年外),布劳恩一直担任首相,形成了以布劳恩和内政部长斯韦林为代表的“布劳恩——斯韦林体制”。值得注意的是,在普鲁士还实行了意义深远的公务员和警察制度的改革。例如:在行政部门,任命了许多来自社民党的成员,他们富有工会工作的经验,有助于解决劳工问题^[9](P.47)。在警察的征召、教育和训练、处理公共关系等方面,普鲁士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涌现出了一批以柏林警察局长阿尔伯特·克谢辛斯基为代表的忠于共和国、具有良好素质和领导才能的高级警官。

甚至在保守势力的基地、共和国第二大州的巴伐利亚也出现了某些积极的变化:巴伐利亚人民党的海因里希·黑尔德从1924年—1933年一直担任州总理。民主宪政在该州得到恢复,黑尔德的立宪政治理想和天主教信仰以及他对纳粹运动的不信任使州政府拉开了与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距离,黑尔德也小心翼翼地避免同中央政府发生冲突。

对于魏玛德国来说,是否能争取军队心悦诚服地站在共和国一边,是一个生命攸关的大问题^[9](第201页)。1924—1928年,军队显示出更大程度上愿意与共和国政治家合作的意愿。1926年10月,陆军司令泽克特因接受皇太子参加秋季军事演习而被迫辞职,10月12日《时代》周刊发表社论,称此举“卓有成效地维护资产阶级的权威使德国政府大大加强了”^[10](第93页)。继任的海耶将军甚至承认在处理与民事当局的关系时,军队有时也犯有错误^[8](P.129)。国防军甚至准备在军事政策上与内阁制定的外交和经济战略合作。他们表示愿意切断与反共和国准军事组织的联系^[7](P.101)。1928年1月,国防部长格勒斯因为国防部违背宪法、讳莫如深的财政管理而下台,格勒纳被任命为国防部长,总理、内阁和国会预算委员会部分成员获得了对军队预算和秘密资金的知情权。

兴登堡当选为总统虽保守主义的重大胜利,遭到中产阶级的广泛批评,但兴登堡的当选短期内也具

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兴登堡的当选使许多忠诚于旧政权的德国人开始团结在共和国的周围^[5] (P. 201), 它还提高了共和国在中间阶级中的威望^[11] (P. 250)。在兴登堡当选为总统的鼓舞下, 民族人民党 1927 年第二度加入政府^[12] (P. 293)。从实际效果来看, 只要国会能继续工作, 共和国政治机构在起作用, 兴登堡还是努力履行他作为共和国总统的职责的^[9] (第 296 页)。

随着相对稳定的到来, 拥护和捍卫共和国的情绪增强了。1924 年“黑—红—黄帝国旗帜团”建立, 短短一年“国旗社”就拥有 100 多万成员, 成为德国最成功的准军事组织。1928 年, 甚至连德国民族人民党也投票支持对 1922 年法律的修改, 禁止前德皇回国。同年 8 月 11 日还规定了“宪法节”。

二

在魏玛共和国政治上相对稳定的同时, 共和国政治也潜伏着深刻的危机。

拥护共和国的左翼政党和中间政党力量很不平衡。在社民党、民主党、中央党、人民党 4 党中, 社民党占有压倒性的优势, 在 1924 年到 1928 年举行的 3 次国会选举中, 社民党所获得的议席占 4 党总议席的 42.0%—53.7%。在经过了 1924 年 12 月国会选举中力量的短暂回升后, 民主党、人民党、中央党甚至社民党在国会选举中的势力和影响出现了下滑的趋势。这种情况以民主党衰落最为典型。相对稳定时期民主党在 3 次国会选举中的选票从来没有超过 6.3%。作为国会中第一大党社民党组织发展处于低谷时期, 并且面临着资产阶级化、官僚化和年纪老化的问题。艾伯特总统的去世与兴登堡当选总统, 使社民党的政治势头大大减弱。由于社民党在这一时期的多半时间未参加政府, 其活动范围和影响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相对稳定时期, 建立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努力一再受挫。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不久, 德国民族自由党和进步党曾就加强合作、建立统一政党进行过商讨, 但收效不大。1924 年 5 月的国会选举, 民主党和人民党都遭到挫折。在民主党内部, 新的党主席埃里希·科赫—韦塞尔极力赞成与人民党联合, 但却遭到施特雷泽曼的拒绝。特纳把这一次建立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失败看作是对共和国的一次沉重打击^[3] (P. 166-167)。与拥护共和国的左翼政党和中间政党影响降低的同时, 相对稳定时期德国政党的碎片化现象大大加强, 一系列追求地方利益、经济利益等特殊利益的政治集团和党派蜂起, 且势力愈来愈大。1920 年在国会选举中提出政党名单参加选举的政党为 24 个, 1924 年 29 个, 1928 年 32 个^[13] (第 59 页)。在这些小党中, 最大和最成功的是“经济党”, 它在 1928 年 12 月的国会选举中获得了 4.5% 的选票和 23 个议席。面临 20 年代农业危机, 形形色色代表农民利益、要求对农业实现保护和廉价信贷政策的政党也不断涌现。政党政治的碎片化产生了深远的后果。在 1924 年 5 月国会选举中, 各小党和特殊利益集团得票总数比 1920 年 6 月的国会选举增加了 6 个百分点, 而社民党、民主党、中央党、人民党得票总数却比 1920 年下降了 8.6 个百分点, 从而失去了国会中的大多数。恩斯特·特勒尔奇甚至把选举的结果视为“支持新宪法的中间派的毁灭”^[9] (第 239 页)。随着经济党、捍卫德国人民公正和再估价党等的崛起, 在 1926 年萨克森州的选举中, 民主党、人民党、民族人民党分别丧失了 1924 年 12 月国会选举中在该州获得总选票的 42.0%、28.7%、37.6%^[14] (P. 343)。人民党、中央党等的力量和影响的减小是推动它们在 20 年代后期右转的重要外部因素, 而特殊利益集团和小党在大萧条深渊中成员和选民的不断溃散以及向纳粹党的汇集, 无疑为希特勒将纳粹运动发展成为以中间阶级为主体的广泛的群众运动起到了“蓄水池”的作用。

反共和国的极右政党在 1925 年后重新聚集力量, 准军事组织势力迅速发展, 它们在反对共和国的旗帜下开始了联合行动。相对稳定时期是纳粹党和纳粹运动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 纳粹党实现了几大跨越: 希特勒通过《我的奋斗》和《希特勒秘密之书》构建起了纳粹思想体系; 纳粹实现了由暴力推翻共和国战略向通过合法的议会渠道夺取国家权力战略的重大转变; 希特勒按照其意识形态和元首原则统一了纳粹组织, 健全了纳粹地方机构, 实现了组织革命, 纳粹还通过外围组织等不断扩充在中间

阶级中的影响。经过几年努力,纳粹党发展很快,1929年增加到17.8万人。右翼的民族主义政党——民族人民党也发生了重大蜕变:1928年底,前克虏伯董事、媒体大亨阿尔弗雷德·胡根贝格出任该党领袖,这标志着该党温和的保守主义时期结束,并开始毫不妥协的反民主的斗争。他们逐步在反对共和国的旗帜下加强了与纳粹党的合作。反动的军国主义武装组织“钢盔团”迅速壮大,1929年达到100万人。1929年下半年,由民族人民党、钢盔团、泛德意志联盟、纳粹党组成的右翼联盟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争取公民表决、反对“杨格计划”的联合行动。埃尔德曼认为:“与民族人民党结成联盟,为民族社会主义者的宣传向资产阶级圈子内渗透并为他们次年9月的第一次重大选举胜利创造了条件。”他还强调:必须把民族人民党人同民族社会主义者在反对“杨格计划”斗争中的这一联合看做是“阿道夫·希特勒取得政权的真正开始”^[9](第335页)。

在共和国敌人加紧进攻的同时,共和国自身政治的右倾化程度不断加深。在1919年国民议会选举中,魏玛联盟曾经获得了3/4的选票和330多个席位,1920年6月的国会选举,魏玛联盟已经失去了多数派的地位。从1923年起直到1930年,共和国政府不得不与人民党联合组织政府,1925年、1927年反对共和国的右翼民族主义政党民族人民党两度参加政府,这被视为共和国政治右转的重要标志。从1924年底开始的对艾伯特总统的攻击、特别是1925年老军国主义者、君主主义者兴登堡当选为共和国总统是魏玛政治右倾化的又一重要表现。在历史学家艾克看来,兴登堡当选为共和国总统“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胜利,是共和国和议会制度的严重失败”^[15](第344页)。兴登堡的当选反映了20年代中期超过总数一半以上选民的政治倾向——对威廉帝国专制和秩序的向往和对魏玛民主的逃离,标志着德国选民和政治的明显右转。甚至在兴登堡较好地履行总统职责的20年代,兴登堡违背宪法,干预政党政治,强化总统权力的情况也时有发生:1926年夏,兴登堡以公开信的形式介入就无偿没收诸侯财产而举行的公民表决,总统还利用议会与政府的争执造成的政府危机,抬高自己的威望,1928年总统任命格勒纳为国防部长,并在自己的周围建立起与国会竞争的权力中心。

甚至在中央党和人民党内部,向右转的倾向也非常明显。作为超越阶级、由天主教徒组成的政党,中央党在魏玛政治舞台上扮演左右逢源的角色。1928年科隆党代表大会选举高级教士卡斯为马克思的继承人,卡斯特别强调党与天主教的联系,将党引上了一条彻头彻尾的保守和民族主义的道路。1930年在布吕宁的领导下,中央党更是热衷于实行总统独裁,这是对共和国民主的沉重打击。作为德国工业垄断阶级利益的代表,人民党内的右翼一直极力反对与社会民主党合作。1929年施特雷泽曼逝世后,其继承者丁格尔戴无意推行施特雷泽曼的既定路线,该党迅速滑进了极右派的阵营。

相对稳定时期共和国政治的深刻危机还表现在政党和议会制度危机重重,民众对议会民主充满了幻灭感,社会上充斥着对专制的渴望。随着各政党分歧的不断扩大,组织一届多数派政府愈来愈困难。“将没有合作历史的不同政党召集在一起并且要求他们为了公共的利益作出重要妥协一直无休止地折磨着共和国的领袖们”^[16](P.52)。这一时期政府的组成实际上只有三种选择:由中央党、民族人民党、人民党、甚至包括民主党组成的中—右联盟,它们在内政上能协调一致,但在外交上难以取得共识;由社民党、民主党、中央党、人民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它们可以在外交上合作共事却在内政上争斗不已;由中央党、民主党、人民党组成的中间联盟。由于政党之间的裂隙,政府往往得不到议会多数的支持,甚至连一些微不足道的议题都能使政府瘫痪甚至倒台:1925、1926年围绕关于对旧的诸侯财产的处置,1926年关于教会学校问题都发生过激烈的争论,1926年5月的“旗帜之争”最终导致了路德内阁的垮台。1928年11月在德国国会甚至上演了这样一幕滑稽剧:屈服于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压力,社民党总理米勒投票反对由他领导的内阁并在他主持下通过的一项关于军事开支的决议。政府与议会的纷争,导致内阁更迭频繁,总理地位受到严重削弱,自1924年起,政府危机频频爆发,组建大联合内阁的希望一再落空,政局动荡不宁仍是相对稳定时期魏玛政治的主要特色。

在德国政治文化中,在受到教育的中间阶级中长期存在着对政治的疏远和对政治家的轻视。相对稳定时期魏玛民主的潜在危机,加深了这种偏见。1924—1928年是共和国史上合格选民参加国会选举

的低谷时期。民主党党员古斯塔夫·施托尔佩尔1929年曾满怀忧虑地指出:“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是部长们的联盟,而不是政党的联盟。这里没有政府的政党,有的仅仅是反对党。”^[17](P.68)对政治的漠视和厌倦开始甚嚣尘上,政党政治日益声名狼藉,《法兰克福报》要求,“结束这种议会党团的混乱局面”,《德意志汇报》断言,“人民深深渴望着领导和权威”。专政计划成了最流行的时尚。这种对专制的呼唤和对政治强人的期盼,瓦解了魏玛民主政治,为纳粹的上台提供了肥沃的政治土壤。

三

相对稳定时期,德国在政治上相对稳定的同时,潜伏着深重危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魏玛共和国虽然是在废除了半封建的君主立宪政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民主制的根基并不十分坚固。由于艾伯特、谢德曼“没有勇气清除旧帝国的代表”,主张“在继续发展现存国家机构的基础上实现议会民主制”,魏玛共和国垮掉的仅仅是封建帝国的外壳。资本容克贵族仍然控制着军政大权和经济命脉,国防军成为旧势力的“国中之国”。帝国时期的旧官僚们拥有“处理部务的最大权限”,“学校课程仍然保留着民族主义者和极端残暴的君主政体主义者的无耻谎言”。共和国政权号称是“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政权”。旧的反对势力的广泛存在和旧的专制思想的深刻影响,成为相对稳定时期民主的隐患和政治右倾的重要根源。

魏玛共和国是在大战中失败了的容克(军官团)与社民党、软弱的资产阶级温和派政党联合镇压了“十一月革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和国赖以建立的政治基础,是以社会民主党为主的、包括某些民主的和天主教的以及自由资产阶级政党结成的广泛联盟^[18](第109页)。共和国的存在维系于德国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暂时的势均力敌的力量平衡,双方力量的消长变化直接影响共和国的政治状况、甚至共和国的生存^[19](第313页)。

相对稳定时期,德国工业界开展了广泛的“产业合理化”运动,德国工业出现了新的集中浪潮。到1929年,拥有500万马克以上资本的大企业占有的资本,在全德企业资本总额中的比重达到40.4%。德国甚至产生了法本化学工业公司和联合钢铁公司等超级垄断组织,到20年代中期,德国约有2500家辛迪加。政治力量的天平重心开始偏向企业主。资本与劳工的关系迅速由合作向冲突和对抗发展。

资本与劳工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以8小时工作日为中心的关于劳动条件的争论。(2)强制国家仲裁制度。(3)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政策的争论。劳资的冲突自然影响了德国的党派政治。人民党内部代表农业集团和重工业集团利益的右翼对大联盟的经济政策愈来愈感到不满,他们尤其反对人民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合作政策。1923年底,围绕8小时工作日等的争论,施特雷泽曼大联盟内阁倒台了。由于社民党从1923—1928年一直不参加政府,新的政府的诞生要么是得到社民党容忍的由民主党、中央党、人民党等组成的少数派中间联盟,要么向右延伸,吸纳民族人民党参加政府,以取得内政上的一致。与劳资关系相联系,社民党采取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魏玛政治也产生了深远影响。魏玛共和国是建立在德国在大战中失败和“十一月革命”失败的基础上的,这使社民党从一开始就遭到左右两翼的抵制和反对。由于担心参加政府和向资产阶级政党让步,可能会丢失自己的选票,社民党对参加联合政府颇为踌躇。相对稳定时期,社民党通过格尔利茨纲领(1921年)、海德堡纲领(1925年)、基尔代表大会(1927年),逐步完善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改良主义思想体系。

在社民党改良主义思想和战略指导下,尽管1924—1928年6月社民党一直未参加联合政府,但是社民党始终把维护“国家利益”和现存的民主制度当做制定政策的出发点,资产阶级执政党的主要内外政策得到了社民党的支持和容忍。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反对党,社民党利用自己在国会的影响,在某些具体政策问题(如8小时工作制、税收改革、价值增值、关税政策和商业政策等)上,曾与资产阶级联合政府针锋相对,分庭抗礼,以维护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切身利益。

如何评价这一时期德国社民党的策略、路线,这是一个困难而有争论的课题。社民党的“联盟政策”

一方面使社民党不能真正满足工人阶级的愿望,它在工人中的威望也降低了,社民党争取中间阶级的努力也未获得很大成功。另一方面,社民党对“政治民主”“经济民主”以及社会主义奋斗目标的坚持,激起了重工业界大资本家集团的恐惧和仇恨。1928年社民党米勒大联盟内阁建立,社民党与军官团在扩充军备问题上矛盾迭起,由于重工业界代言人的加入,右翼势力不断加强的人民党等与社民党在社会政策上的矛盾愈来愈尖锐,重工业大资本家迅速从民主党、人民党投靠民族人民党等极右政党,1928年后半年,中央党、人民党等纷纷右转、民族人民党日趋激进化不是偶然的。

至于这一时期德国政党政治加速碎片化,小党和特殊利益集团的纷纷涌现则与共和国“中间等级”的恐慌有很大关系。20年代中期,德国中间等级人数高达1200万至1500万,占全国人口1/4,连同他们的家属,超过了德国总人口的一半^[20](第89页)。共和国建立初期,中间等级对资产阶级温和派曾经寄予厚望。但是,共和国“阶级合作主义”对中间等级的冷落,特别是1920—1923年通货膨胀给中间等级灾难性的打击,使他们对共和国深感失望。危机过后,政府为稳定通货、平衡财政,采取了发行新币、紧缩开支、削减政府雇员工资、增加税收、废除8小时工作制等措施,特别是1924年2月第3个紧急税收法令,激起了债权人的强烈不满。为捍卫自身利益,中间等级成立了许多代表各自地区、行业等特殊利益的压力集团和利益集团,如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国农民联盟、黑森农民联盟、天主教农民联盟、房地产及房屋所有者党、帝国中间阶级党等。1924年5月国会选举后,两个代表债权人利益的政党——重新估价与建设党和重新估价与重建党开始形成,稍后又成立了重新估价全国协会。中间等级的困境和游离于共和国民主政治,为希特勒“针对陷入贫苦和绝望的小资产阶级群众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许诺从危机的困难中开辟一条民族社会主义的出路”指明了方向^[20](第96—97页)。

值得注意的是:一战后德国扭曲的民族主义和民族情感对共和国政治的右转也有不小的影响。一战的失败,使德国人民产生了深重的民族挫折感,在他们的心目中,魏玛共和国“不是建立在魏玛宪法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凡尔赛和约的基础上”^[3](第560页),修改不平等条约成为德国人民的普遍呼声。在接受凡尔赛和约后举行的1920年6月国会选举中,反共和国的右翼民族主义政党——人民党、民族人民党取得了重大胜利。相对稳定时期,民族人民党在三次国会选举中的比例都在14%以上,一直保持着国会中第二大党的角色。在1924年5月国会选举中遭到挫败的施特雷泽曼也开始改变了对民族人民党的态度,考虑让他们参加政府,以争取他们对外交政策的支持^[5](P.170-175)。伴随德国逐步摆脱“凡尔赛和约”的阴影,逐步恢复大国地位,德国的民族情绪进一步高涨,1929年,在反“杨格计划”的旗帜下,反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政党和准军事政治建立起统一阵线,它“是希特勒命运的转折点,标志着德意志共和国最后倒台第一阶段的来临”^[21](P.171)。正如德国学者指出的:“作为民族力量和统一动力的民族主义就像它在1848年所干过的那样,在1918年以后侵蚀了民主的基础。”^[22](P.133)

[参 考 文 献]

- [1] [德] 苏珊·米勒,海因里希·波特霍夫. 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M]. 北京:求实出版社,1984.
- [2] [德] 海因茨·赫内. 德国通向希特勒独裁之路[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 [3] [美] 科佩尔·S·平森. 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下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 [4] 曹长盛.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一九一四——一九四五)[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 [5] TURNER, Henry Ashby, JR. Stresemann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Weimar Republic [M].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Publishers 1963.
- [6] FOWKES, Ben. Communism in Germany under the Weimar Republic [M].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4.
- [7] BERGHAIN, V. R. Modern Germany: Society, Economy and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8] NICHOLLS A. J. Weimar and the Rise of Hitler: Fourth Edition [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2000.
- [9] [德] 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 德意志史:第四卷世界大战时期(1914——1950):上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 [10] [瑞士] 埃里希·艾克. 魏玛共和国史(下卷)——从洛迦诺会议到希特勒上台(1925——1933)[M]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4.
- [11] RAFF, Diether. A History of Germany: from the Medieval Empire to the Present. Translated from German by Bruce Little [M] . Oxford, Hamburg, New York: Berg, 1988.
- [12] CARR, William. A History of Germany, 1815—1990; Fourth Edition [M] . London; New York: Arnold, 1991.
- [13] 郭庆秋. 德国选举制度与政党政治[M] . 新店: 志一出版社, 1996.
- [14] RETALLACK, James. Saxony in German History: Culture, Society, and Politics 1830—1933[M] .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0.
- [15] [瑞士] 埃里希·艾克. 魏玛共和国史(上卷)——从帝制崩溃到兴登堡当选(1918——1925)[M]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4.
- [16] BOOKBINDER, Paul. Weimar Germany: The Republic of the reasonable [M] .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6.
- [17] LEE, Stephen J. The Weimar Republic [M]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 [18] 吴友法. 冒险、失败与崛起——二十世纪德意志史[M] .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
- [19] 丁建弘. 德国通史[M] .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 [20] 吴友法. 德国法西斯的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研究[M] .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 [21] PASSANT, E. J. A Short History of Germany: 1815—1945 [M] . London·New York·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
- [22] ROBERTS, Geoffrey K. West German Politics [M] . London: Macmillan, 1972.

(责任编辑 桂 莉)

The Weimar Republic Democratic Politic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lative Stability

CHEN Cong-yang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CHEN Cong-yang (1965-),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History, Wuhan University, Professor, Xianning College, majoring in contemporary history and Germany history.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relative stability, the parliamentary democratic system of the Weimar republic was maintained and expanded; While the pro-republic parties held a dominant position, the anti-republic parties was in low tide; Prussia was emerging as “the bulwark of democracy”; Some favorable changes had taken place in Bavaria and Reichwehr; The morale of pro-republic was raised. At the same time, the power of pro-republic parties showed the tendency that its development lost balance and its influence declined;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party politics’ fragmenting, the re-concentration and allied action of the anti-republic forces, democratic politics’ tendency towards the right, crises of the party system and the parliamentary system, all these showed the relative political stability of the Weimar republic, which was inseparable from these factors; powerful old force of republic, conservative and reactionary thoughts, the changes of the strength’s comparison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the tactful route adopted by SPD, the panic in the Mittelstand, 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sentiments.

Key words: the Weimar Republic; democratic politics; relative stability